

孟浩然行迹考

萧晓阳 李东昀¹

【摘要】 孟浩然家在汉阴，所居之涧南园位于襄阳府城南冶城旁、岷山下，地近白马山。诗人早年曾北上幽州、到达蓟门，开元九年张说任中书令以后初到洛阳，往来于京洛间，十四年秋天离开洛阳赴越中，先后在杭州、越州观潮看山宴游，西至富春江，东到天台、永嘉，开元十六年回襄阳。

【关键词】 孟浩然 汉阴 燕蓟 洛阳 吴越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54X(2021)02-0056-05

孟浩然作为唐代大诗人，诗歌散佚较多，难以系年。有学者甚至以为：“其诗歌欲按作者行踪编年，可定者未及十之三四。”^①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与谭优学《孟浩然行止考实》论述颇多独到之见，但仍有许多具体问题未及深论。本文拟探讨孟浩然行迹中的几个疑点，以求正于方家。

一、家在汉阴

孟浩然为襄州襄阳人，诗人多次提及自己的家乡，然而孟氏故园遗址在何处却难以确指。有学者称孟浩然家在冶城，亦有孟氏祖传之园庐在汉阴镇之说。今据文献考述如下：

孟浩然诗歌多次提到家乡襄阳。其《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谓：“敝庐在郭外，素产唯田园”，可以推知诗人家在城外；《岁晚归南山》又谓：“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则当住南山之下；《夜归鹿门寺》：“人随沙路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可见又在鹿门有家业。可以看出，孟浩然家在襄阳城外南山下，在鹿门山也住过。而《南山与卜老圃种瓜》特别点明了家业详情：

樵牧南山近，林间北郭赊。先人留旧业，老圃作邻家。不种千株橘，惟田五色瓜。邵平能就我，开径有蓬麻。^②

孟浩然主要居处在祖业田园，与卜老圃为邻，离南山近，距府城远。然而，从以上诗歌中尚看不出具体地点。孟浩然诗歌中多次出现“汉阴”。“田园在汉阴”“闭门江汉阴”“停策汉阴多”都与家业或生活息息相关，可以看出孟浩然家在汉阴。据相关文献考证，孟浩然诗中的汉阴当具有以下几个地理特征：

其一，汉阴在孟浩然诗中处襄水之南。关于襄阳，《水经注》载：“一水东南出。应劭曰：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③可知襄水东南流，襄阳城在水之北。孟浩然《早寒江上有怀》：“我家襄水上，遥隔楚云端。”孟浩然自谓：“樵牧南山近，林间北郭赊”，则孟家当在襄水之南。明代《（天顺）重刊襄阳郡志》载：“汉水又名襄水。”^④唐代也有可能称襄阳附近的汉水为襄水。然而，如果孟家在《水经注》所指的襄水南岸，则可能由水路从汉阴驿与岷首还家。涧南园为诗人居所，《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上巳日涧南园期王山人陈七诸公不至》皆多次称住处为涧南园，此涧或为襄水。汉阴从字义上讲为汉水之阴，如果诗人居襄水畔，则诗中的汉阴自然是指襄水以南的地域。

¹作者简介：萧晓阳，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4；李东昀，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4。

其二，冶城、岷山、鹿门皆属广义的汉阴。关于冶城，孟浩然诗有《题明禅师西山兰若》：“日暮方辞去，田园归冶城。”⁽⁵⁾“冶城”当为“冶城”，明顾道洪参校本作“冶城”⁽⁶⁾，此处指诗人住所涧南园。冶城似为古地名，孟浩然家在田园，未必居于冶城旧址，当住近冶城。诗人日暮归家，可见家在西山兰若附近。唐代张说诗《襄州景空寺题融上人兰若》：“高名出汉阴，禅阁跨香岑”⁽⁷⁾，说融上人名闻天下，居于汉阴。孟浩然常游于此地，《游景空寺兰若》《过融上人兰若》《题融公兰若》皆为游景空寺之诗篇。光绪十一年《襄阳府志》：“景空寺在城南十里白马山。”⁽⁸⁾孟浩然《题融公兰若》：“归骑夕阳催”；《过融上人兰若》：“黄昏半在下山路”，可见孟浩然所居之涧南园距景空寺不过数里之地。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谓：“他不仅常来西、南郊外临近几处名胜勾留，而且往往日暮始归”⁽⁹⁾，断定孟氏故园在岷山附近，大致不误。笔者据孟浩然诗《陪卢明府泛舟回》：“百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诗题下佟注：“凌本、嘉靖本、丛刊本多出‘岷山’”⁽¹⁰⁾，可见孟浩然故园涧南园是岷山下的依山小园，傍水而居。据《襄阳府志》：“岷山在县南七里，一名岷首山。”⁽¹¹⁾大致可以推知，孟浩然家在白马山以东、岷首以西。至于孟浩然曾经隐居过的鹿门山，如杜甫《喜晴》所言：“汉阴有鹿门”⁽¹²⁾，也属于汉阴地域。

其三，汉阴非汉阴镇、汉阴驿、汉阴城。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汉阴是襄阳城南一带地域之泛称，故与文献所载汉阴镇、汉阴城、汉阴驿不同。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一载襄州八镇四山二水，八镇为“大安、凤林、岷首、沈碑、汉阴、朝宗、八叠、东岸”⁽¹³⁾，其中有汉阴镇，然未见唐代文献有汉阴镇之说。而凤林、岷首、沈碑三镇似为依次排列。据《襄阳府志》：“凤林寺在城南七里”⁽¹⁴⁾，岷首在县南七里，而沈碑则当邻近岷首，由“山水水中，杜元凯沉碑处”⁽¹⁵⁾得名。疑汉阴镇为汉阴驿故地，朝宗镇应在江畔，东岸镇必不在江之西。八镇或由近至远依次排列，孟浩然故园当在凤林与岷首之间，距汉阴镇虽近，并非一地。至于汉阴驿故地，据白居易《襄阳舟夜》：“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驿。秋风截江起，寒浪连天白。”⁽¹⁶⁾汉阴驿显然在汉江边。汉阴更非谷城县汉阴城。谷城距襄阳甚远，《元和郡县图志》载，谷城在襄阳府城西北方，“东南至州一百四十五里。”⁽¹⁷⁾《孟浩然集注》佟注误以为诗中汉阴在谷城县：“《舆地纪胜》卷八二《襄阳府·古迹》：汉阴城，在谷城县北，汉为县，今废城存。”⁽¹⁸⁾然孟浩然居襄州襄阳县，非襄州谷城县，此注与事实不合。故汉阴非汉阴镇、汉阴驿，更距汉阴城甚远。

据此可以推知，孟氏故园涧南园位于襄阳城南之汉阴、冶城旁、岷山下，地近白马山。

二、北上燕蓟

孟浩然是否北上燕蓟，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四库提要》谓《同张将蓟门看灯》一首“非浩然游迹之所及”⁽¹⁹⁾。其依据仅缘于对《同张将蓟门看灯》“异俗非乡俗，新年改故年。蓟门看火树，疑是烛龙然”⁽²⁰⁾真实性的质疑。从现存文献看，孟浩然北上燕蓟是可能的。

首先，宋代文献已著录此诗。尽管今存宋蜀刻本未著录蓟门看灯诗，但“刘本补、活字本三、凌本下、嘉靖本四、丛刊本四、《统签》一〇八、《季稿》二〇册、《绝句》四”⁽²¹⁾均收入。收录此诗的文献中，宋刘辰翁评点、明顾道洪参校本与宋刘辰翁、明李梦阳评、明凌濛初刻套印本两种显然系据宋本翻刻之明刊本。至于天一阁藏明活字本，明嘉靖十六年屠倬、陈凤等刻王、孟集本，四部丛刊本初编本，胡震亨《唐音统签》，清代季振宜辑《全唐诗稿本》，亦自有其渊源。似不能仅因宋蜀刻本未收录即将此诗定为伪作。现存文献尚无法认定《同张将蓟门看灯》非孟浩然诗歌。

其次，从张说行迹看，孟浩然随行至幽州是可能的。今人据《宝刻丛编》卷八张说所撰《豫州刺史魏叔瑜碑》于开元六年五月立推断：“张说开元六年五月既已在豫州撰‘魏叔瑜碑’，则其由荆州始程就当在是年的四月前后。”⁽²²⁾可证张说赴任幽州前曾经豫州，此诗中的张丞相或即张说。再看孟浩然的行迹，他很有可能曾陪同张说游历荆州。如果孟浩然《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作于诗人客居张说幕下之时，则《陪张丞相登荆州城楼同寄荆州张史君》中“蓟门天北畔，铜柱日南端。出守声弥远，投荒法未宽”似与张九龄《登荆州城楼》远而与张说赴任幽州的背景更近。可见，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论《同张将蓟门看灯》诗谓：“颇疑此系孟浩然于开元七年至十一年间客张说幕中‘同’张咏之作。”⁽²³⁾是符合逻辑的判断。

再次，前人质疑的孟浩然诗作并非都是误收的篇目。一方面，就文献版本而言，蜀刻本不能作为判断孟浩然诗集中诗歌是

否为孟浩然所作之标准。《四库提要》就指出了蜀刻本诗集序中可能存在的外误：

至序中丞相范阳张九龄等与孟浩然为忘形之交语，考《唐书》，张说尝谪岳州司马，集中称张相公、张丞相者凡五首，皆为说作。若九龄则籍隶岭南，以曲江著号，安得署曰范阳？⁽²⁴⁾

由此可以推断，诗集中同样可能出现外误。《同张将蓟门看灯》不见于宋代蜀刻本也无法断定此诗非孟浩然作。从佟培基所注《孟浩然诗集注》看，宋代蜀刻本收录孟浩然诗歌共二百一十一首，宋本集外诗达五十九首、残句六处。收入的集外之作基本上可以肯定为孟浩然诗。从见于宋蜀刻本的其他诗歌之归属可以看出这一点。孟浩然诗集蜀刻本《除夜有怀》可能非孟浩然诗，《唐诗三百首》署为崔涂作，李嘉言以为是“崔涂诗误入《孟浩然集》”⁽²⁵⁾。可见蜀刻本虽早，也并非尽善，不能仅因蜀刻本无《同张将蓟门看灯》即断定此诗非孟浩然作。另一方面，就诗歌篇目而言，存疑的篇章未必都是他人所作。蜀刻本收录的《长安早春》很可能是孟浩然诗。《四库提要》谓：“今考《长安早春》一首，《文苑英华》作张子容。”⁽²⁶⁾今据相关文献所录《长安早春》（“戍关唯东井”），《文苑英华》卷一八一、《唐诗纪事》卷二三、《唐诗品汇》卷七六，均作张子容诗；《全唐诗》卷一一六谓“一作张子容诗”⁽²⁷⁾。但李嘉言考证，此诗是“孟浩然诗误入《张子容集》”。⁽²⁸⁾据此，《四库提要》否定《同张将蓟门看灯》为孟浩然之作尚乏足够的证据。

可见现存文献尚无法否定孟浩然北上幽州、到达蓟门之记述。

三、久居洛阳

《新唐书》本传称孟浩然“年四十，乃游京师”⁽²⁹⁾。然孟浩然在此前已久居洛阳。但居洛之时间、交游、所求及出入路径仍有待深入探讨。

关于孟浩然寄居于洛阳的具体时段，学术界至今未有定论。近年来已有学者认为孟浩然初至洛阳时间在四十岁之前。据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孟浩然于“开元七至十一年，三十一至三十五岁，北去幽州，客张说幕府，往来河朔洛阳。”⁽³⁰⁾则孟浩然寄居洛阳不晚于开元十一年。如据王士源序言所载开元二十八年为卒年，则孟浩然初至洛阳时三十五岁。陈铁民认定“孟始入洛的时间，当在开元十二、三年。”⁽³¹⁾孟浩然三十六岁。二说与《新唐书》所载似有抵牾，然与《资治通鉴》所载唐代史事不悖。据《资治通鉴》记载，开元十年“春正月，上行幸东都，以刑部尚书王志愔为西京留守。”⁽³²⁾十二年“十一月，庚午，上幸东都。”⁽³³⁾“唐玄宗于开元十二年十一月至洛阳，直到十五年十月才回到长安，这大概就是作者不赴长安而到洛阳求仕的原因。”⁽³⁴⁾又据《通鉴》，开元九年“癸亥，以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³⁵⁾张说在朝廷地位日隆。十年夏四月兼知朔方军节度使，十一年为中书令，皆适合引荐俊才。孟浩然早年即求张说引荐，此时当寄居在洛阳。如果这样，孟浩然初居洛阳当不晚于开元十一年。

孟浩然在开元十四年之前已寄居洛阳还可从孟浩然诗歌得到印证：其一，孟浩然诗《书怀示京邑同好》说的是自己年已三十仍无机会用世，有意出仕。此时张说为中书令，孟浩然洛阳之行当为功名而来，不遇而去。其二，尽管不能依据《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之少年意气判定孟浩然三十余岁已到长安，但必定已到洛阳。孟浩然与储光羲等来自江南的开元十四年进士群体交往密切。《唐才子传》载，崔国辅为“开元十四年严迪榜进士，与储光羲、綦毋潜同时。”⁽³⁶⁾则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均为开元十四年进士。孟浩然可能通过荆南綦毋潜与润州储光羲及山阴崔国辅相识。《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诗题称储十二可能因为此时储光羲尚未及第，可以看出孟浩然初至京洛当远早于开元十四年。其三，再看《李氏园卧疾》：“年年白社客，空滞洛阳城。”佟注谓此诗作于开元十七年孟浩然落第后客滞洛阳时，然诗中提及久居白社，自当作于白社交游时期，必定在诗人于开元十四年游越之前。孟浩然卧病李氏园时已在洛阳多年，故初居洛阳时间应早于开元十二、三年。参照《答秦中苦雨思归而袁左丞贺侍郎》：“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二毛催白发，百镒罄黄金。”诗题或有舛误，明顾道洪辑本作《秦中苦雨思归》，可以看出，此时诗人已久滞秦中。孟浩然为学三十载，并非指闭门江汉阴的时间，诗人久居京洛，年已“二毛”。潘岳《秋兴赋序》：“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³⁷⁾又据《资治通鉴》玄宗开元十三年：“是岁，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

五钱，粟三钱。”⁽³⁸⁾洛阳米贵，与“百镒罄黄金”之说相符。可见孟浩然初至京洛时当未到四十岁。如果孟浩然诗之“秦中”不是泛指京洛一带而仅指关中，诗人可能三十余岁已赴长安。考虑到玄宗常居洛阳，诗人开元十年后必定赴洛阳。可见，从孟诗内容同样可以推知，孟浩然开元十一年已寄居洛阳。孟浩然离开洛阳赴越的时间当在开元十四年秋。开元十四年春，玄宗“罢说中书令”⁽³⁹⁾当是孟浩然此年秋日离开洛阳的重要原因。据《江上寄山阴崔国辅》，春日有期，草木将枯之际已在行程之中。陈铁民以为孟浩然离开洛阳时间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⁴⁰⁾。孟浩然可能因为出仕无望离开洛阳前往越中，《宿建德江》就是至越后失意情怀仍难以排遣之表述。

孟浩然有再游洛阳的经历。谭优学据《李十四庄赠綦毋校书》中“綦毋校书”推定，綦毋潜自开元十四年中进士到授宜春尉、迁右拾遗，再到校书郎必历经多年，认定孟浩然开元二十二年才再游洛阳。⁽⁴¹⁾具体时间尚有待考证，但必定远晚于开元十四年。洛阳之行与求仕有关，故亦有重游长安的可能。王达津《孟浩然生平续考》谓：“孟浩然多次入京，其可考者有三次。”⁽⁴²⁾由于孟浩然长期旅居洛阳，期间可能回过襄阳，故不能排除三上长安的可能性。《秦中苦雨思归》与《秦中感秋寄远上人》都表明孟浩然有过久居长安的经历。考虑到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中孟浩然“毕夕不赴”⁽⁴³⁾之说，孟浩然最后一次游京洛当在韩朝宗举荐之前。

孟浩然寄居洛阳期间的生活也值得探究。据孟浩然诗歌中的行迹自述，孟浩然曾久居洛阳郊外白社。《宴鲍二宅》记录了当时的生活场景：

闲居枕清洛，左右接人野。门庭无杂宾，车辙多长者。是时方正夏，风物自潇洒。五月休沐归，相携竹林下。开襟成欢趣，对酒不能罢。烟暝栖鸟迷，余将归白社。⁽⁴⁴⁾

此诗在蜀刻本作《宴包二融宅》。诗中咏包融之交游，颇有隐逸之情趣，春末夏初，公余假期，相携洛水之畔，对酒醉饮，傍晚才兴尽而回。虽是宴饮于包融宅邸，也有隐逸之致。从《送席大》《洛下送奚三还扬州》《洛中访袁拾遗不遇》可知，孟浩然与席大、奚三、袁拾遗等亦有诗歌往还。孟浩然在洛阳似乎过着简单清苦的隐居生活。杜甫“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⁴⁵⁾，与诗人自己所言“黄金燃桂尽”说法一致。

可见孟浩然曾两度寄居洛阳，初到洛阳当在开元九年张说任中书令以后，十四年秋天离开洛阳赴越地，再次到洛阳可能已是开元二十二年。

四、漫游吴越

孟浩然从洛阳往游吴越，现存孟浩然诗歌足以佐证。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列出了孟浩然自洛之越经过豫州、江淮途中的主要诗篇及游越行踪，但孟浩然在越地滞留与游历过程仍不甚清晰。

孟浩然此前虽已到过扬州一带，但未曾登览越中胜境。《送谢录事之越》：“想到耶溪日，应探禹穴奇。”表明诗人对越地之游期待已久。而《江上寄山阴崔国辅少府》诗中“忆与故人期”之语则表明诗人与山阴崔国辅少府早已有约在先。孟浩然作《东京留别诸公》后，自洛阳至越地。旅途中有系列篇章，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所列诗篇有：《自洛之越》《适越留别张主簿申屠少府》《问舟子》《宿扬子津寄润州山长刘隐士》《扬子津望京口》《济江问同舟人》等。《孟浩然事迹考辨》未提及的《行至汝坟寄卢征君》《临涣裴明府席遇张十一房六》《夜泊宣城界》《江上寄山阴崔国辅少府》《江上别流人》等当也是此行旅途中所作的篇章。根据诗中提及的山川风物，读者可以勾画出孟浩然此次吴越之行的大致路线：

一是在杭州、越州观潮看山宴游。《早发渔浦潭》是写萧山附近的渔浦潭。《游云门寺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记录的地方较多：

我行适诸越，梦寐怀所欢。久负独往愿，今来恣游盘。台岭践嶮石，耶溪溯林湍。舍舟入香界，登阁憩旗檀。晴山秦望近，春水镜湖宽。⁽⁴⁶⁾

诗人游云门寺之诗提到了耶溪、秦望山、镜湖。《云门兰若与友人同游》可能是同时所作。《与崔二十游镜湖寄包贺》当是与崔国辅游镜湖，诗歌中有“帆得樵风送，春逢谷雨晴。将探夏禹穴，稍背越王城。”可能是到越地后次年春天的旅行记录。《与杭州薛司户登樟亭楼作》《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写杭州湾观潮事。《耶溪泛舟》《题大禹义公房》《夜登孔伯昭南楼时沈太清朱升在座》当是在越州周边游历之记述。

二是西上游历富春江。《游江西上留别富阳裴刘二少府》表明诗人曾沿江西上游历。《经七里滩》是经典的旅行之作：

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复闻严陵濑，乃在此川路。叠嶂数百里，沿洄非一趣。彩翠相氛氲，别流乱奔注。钓矶平可坐，苔磴滑难步。猿饮石下潭，鸟还日边树。观奇恨来晚，倚棹惜将暮。挥手弄潺湲，从兹洗尘虑。⁽⁴⁷⁾

此行当与洞庭无涉，只是歌咏新安偶及之。此诗写游历新安江一段令人洗去尘虑的感触。《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当是此次游历所作，由陶翰《送惠上人还江东序》可知，惠上人“家本富春，栖于天竺。”⁽⁴⁸⁾孟浩然所游之地为富春之天竺山。

三是天台与永嘉之行。诗人临行前有《将适天台留别临安李主簿》，赴天台山，于是有《寻天台山》《宿天台桐柏观》《腊八日于郛（剡）县石城寺礼拜》，其中《寻天台山》云：

吾友太一子，餐霞卧赤城。欲寻华顶去，不惮恶溪名。歇马凭云宿，扬帆截海行。高高翠微里，遥见石梁横。⁽⁴⁹⁾

诗歌中提及了赤城、华顶、恶溪等景致。诗人到天台，拜会了天台道士太一子，遂有《越中逢天台太一子》，宿于天台桐柏观，并到石城寺礼拜。

与此相关的是，孟浩然此行滞留多年，有诗《久滞越中贻谢甫池会稽贺少府》《岁暮海上作》《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国辅少府》《越中送张少府归秦中》，直到《初年乐城馆中卧疾怀归》提及的新年卧疾思归。孟浩然越州之行最重要的事件是在乐城与挚友张子容的交往。《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可能是久别初逢时心绪的记录，《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除夜乐城张少府宅》记在乐城度岁的感受，《初年乐城馆中卧疾怀归》说思乡成疾，《永嘉别张子容》写与张子容告别的心情。不过孟浩然又有《越中送张少府归秦中》，可能是在越州再遇张子容。据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孟浩然“在越前后共四年”⁽⁵⁰⁾。据《久滞越中贻谢甫池会稽贺少府》似为临别赠言：“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说的是在秦望山、会稽山一带滞留了两年，似有意赴京应考。这样推算，诗人居越可能是两年，大约开元十六年离开。在越期间，诗人没有提及穷困。孟浩然是否为旧友张子容幕宾不得而知，也有可能是依托州县学之讲席得以维持生计。从这个角度看，吴越之行有谋生的意味。

综上所述，孟浩然的行迹大致可以作这样的描述：早年居襄阳城南汉阴读书隐居；张说至岳州时以献诗为幕客，孟浩然随之至荆州、幽州；开元九年张说任兵部尚书，孟浩然便寄居洛阳应试求仕，不再居于张幕，中间可能回过襄阳；开元十四年张说罢职，孟浩然夏秋间从洛阳往游吴越；回到襄阳之后，孟浩然年四十游京师，可能赴长安并游洛阳；求仕无果，出游蜀地，经三峡回襄阳；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贬荆州长史，招为幕宾，引疾归，二十八年卒于襄阳。迄今为止，关于孟浩然之行迹，存疑之处仍然甚多。诗人早年到过湘江、赣江流域乃至吴地，在诗中也留下了证据。至于《全唐文》卷三三四载陶翰《送孟大入蜀序》谓孟浩然游蜀，文中称孟浩然天宝年始游西秦与孟浩然卒年不合，序文是否伪作则不得而知。

注释：

1 赵桂藩：《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2(5)(10)(18)(21)(44)(46)(47)(49)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09、70、29、112、538、380、229、272、60 页。文中未标注的孟浩然诗均出自本集。

3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663 页。

4 《(天顺)重刊襄阳郡志》，《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9 页。

5(20)(43)刘辰翁评点、顾道洪参校：《孟浩然诗集》，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卷上、补遗、王士源序。

6(12)(16)(27)(45)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1266、3206、7045、1178、3232 页。

7(11)(14)(15)恩联等修、王万方撰：《襄阳府志》，光绪十一年刻本，卷 5、卷 2、卷 5、卷 2。

8(50)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40 页。

9 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3 页。

10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531 页。

11(24)(26)永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149，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1283、1283、1283 页。

12 王辉斌：《孟浩然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 页。

13(30)(41)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2、49、41 页。

14(28)李嘉言：《李嘉言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11、211 页。

15 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579 页。

16(34)(40)陈铁民：《王维新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73、273、276 页。

17(33)(35)(38)(39)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6749、6762、6747、6769、6772 页。

18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 1 卷，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229 页。

19 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85 页。

20 王达津：《孟浩然生平续考》，《唐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12 页。

21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 334，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381 页。